

12-2012

論《作死不離三兄弟》的烏托邦想像與意識形態

Chun Ho TO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mcsln>

 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杜振豪 (2012)。論《作死不離三兄弟》的烏托邦想像與意識形態。文化研究@嶺南，32。檢自：<http://commons.ln.edu.hk/mcsln/vol32/iss1/4/>。

This 文化評論 Criticism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Lingnan 文化研究@嶺南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論《作死不離三兄弟》的烏托邦想像與意識形態

杜振豪



(圖片來源：<http://www.filmcriticschina.org/?p=2883>)

二零零九年上映的印度電影《作死不離三兄弟》¹（下簡稱《作死》），自二零一一年九月在港上映以來，坊間一致好評，此電影上映至第十三周，票房已達一千九百萬；與此同時，《作死》在台灣也打破了上映時間最長紀錄；在中國內地方面，在此電影還未上映之前已在網絡上熱烈流傳，亦得到廣泛的正面評價。²《作死》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在內地正式公映，贏盡票房和口碑，上映一月累積計票房已達一千三百萬元人民幣。雖然印度及中、港、台三地在文化傳統和經濟發展上有一定

¹ 港譯《作死不離 3 兄弟》，前譯《三傻大鬧寶萊塢》。

² 有報導指出「它沒有在中國大陸公映、宣傳，卻依然走紅國內校園。中國學生觀後感言：『此片在印度之外，恐怕只有中國學生能看懂、共鳴最大！』時隔全球首映一年之後，印度電影《三個傻瓜》在中國校園悄然躡紅——完全依靠中國學生觀眾的口口相傳，以及他們在微博、博客、BBS 上的力薦。」見唐聞佳（2011）。

差別，但均面對相似的教育體制問題。該片如此廣受歡迎，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該片在主題處理方面，成功接合了普遍的社會心理。

法蘭克福學派批評文化工業蒙蔽大眾，電影被稱為「夢工廠」，尤其常被指責為意識形態的生產機器。不過，幻想永遠是妥協而生的產物，論者簡·蓋恩斯（Jane Gaines）引述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的說法指出，大眾文化必須先提供些東西才能蒙蔽我們，假如缺乏了烏托邦功能，意識形態只能製造短暫的欺騙。³本文將嘗試討論《作死》的烏托邦想像，分析該片所接合的社會現實及其超越社會現實的幻想，然後借鑒呂克·博爾坦斯基（Luc Boltanski）對「新資本主義精神」的說法，檢視這種幻想與資本主義精神轉換的關係，從而說明該片的意識形態功能。

1. 激烈競爭的社會壓力

《作死》的故事發生在帝國理工學院，講述一名勇於挑戰權威和傳統，反對死記硬背的學生 Rancho，聯同另外兩位同學 Farhan 和 Raju，與強調競爭和淘汰，擁護高壓式精英教育的院長 Virus 的一場大鬥法，以此作為主要的戲劇張力和矛盾來貫穿全劇。電影以 Farhan 作為敘事者跳入回憶開展敘述，他陳述印度青年面對的社會壓力：「從小開始，成年人便跟我們說生命就像賽跑。如果你不努力跑，別人就會追過你。哪怕是出生，我們都得和三億個精子賽跑。我在凌晨五時十五分出生，五時十六分老爸便正式宣布：『我的兒子將會是工程師。』我的命運就這樣被蓋章決定。至於我想做甚麼？無人過問。」如何逃脫這種單一成功想像強加的命運，可說電影的核心問題，而這個問題又聯繫到印度特別嚴重的自殺現象。

印度的高等教育規模僅次於中國和美國，但高等教育入學率僅僅只有十一個百分比（二零零四年），而且大部份高等院校的教學水平也比較低，唯有七所理工學院能

³ Jane M. Gaines , "Dream/Factory", in *Reinventing Film Studies*, eds. Christine Gledhill and Linda Williams(London: Arnold, 2000), p108

與英、美的一流學府媲美。⁴劇中的帝國理工學院，正是影射印度的最高學府——印度理工學院，其錄取率每年不到百分之二，競爭之激烈可想而知。在這種高度競爭的精英教育體制下，印度學生的自殺率年年攀升，從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的八百人，激增至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的五千八百五十七人，平均每天有十六名學生自殺。⁵

綜觀全劇，自殺問題一直縈繞不去，首先是 Joy 自縊，然後是 Raju 尋死，還有 Virus 兒子的跳軌行為。Rancho 和 Pia 更是先後指責 Virus，其代表的競爭思維和教育體制，是眾人自殺的元兇。在尋死的三人中，Joy 和 Virus 的兒子主要是因為承受不了家庭成員的期望；Raju 則是因為處於改善家庭生活與維護同伴的兩難狀態之中。嚴格來說，激烈競爭帶來的社會壓力，理應著手處理經濟結構及高等教育資源分配等問題，不過電影則將此嫁接到填鴨式教育、盲從權威、單一成功想像等問題之上。換言之，雖然電影接合了高自殺率的社會現實，但卻主要呈現為一種文化觀念的問題，經濟因素幾乎隱沒不見。

二、打破陳規的新主體

電影的敘述以一種公路電影的框架開展。Farhan 和 Raju 在畢業多年後，終於得悉 Rancho 的消息，繼而開車穿州過省追尋 Rancho 的下落，並從中穿插回憶來展開第二敘事層。甫開幕，Farhan 在快要起飛的機艙中得知 Rancho 的消息，隨即詐病下機，又騙到了司機免費載送，而 Raju 得知消息後更是緊張得忘了穿褲子便上了車，而 Pia 則聽了有 Rancho 的消息後選擇逃婚。Rancho 的消息就像一塊石頭，投入了寧靜的湖水當中，立刻打亂了眾人原來的生活。這裡除了刻劃出他們三位與 Rancho 之間的情誼外，也不著痕跡地描繪出 Rancho 那種激起他人熱情和改變的潛能。在整個追尋過程中，不時響起電影插曲《Behti Hawa Sa Tha Woh》：「他像風般自由，他像風箏般高飛。他去之何處，讓我們尋覓，我們被走過的路引導，但他

⁴ 閻鳳橋、施曉光：〈在全球和知識經濟背景下，印度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北大教育經濟研究電子季刊》，總第 19 期，2008 年 3 月。

⁵ 〈經濟發展帶來升學壓力 印度學子自殺率激增〉，苦勞網，2008/04/22。

卻創造了自己的大道」。曲中追求的自由精神貫穿全劇，Rancho 作為自由精神的象徵，一直扮演領導者和啟蒙者的角色，引領 Farhan 和 Raju 走向他們嚮往的烏托邦生活。

導演僅僅用了幾個片段，便強烈地表現了 Rancho 的性格和能力：甫入學便拒絕大學「玩新生」的傳統，並以基本電工原理懲戒學長；當教授在課堂要 Rancho 為「機器」下定義時，Rancho 拒絕背誦書本上的答案，嘗試生活化地解釋，其後教授將他逐出課室，Rancho 隨即把說話簡單複雜化來還以顏色，以突顯背誦答案的荒謬；後來 Rancho 被院長 Virus 迫上台示範如何教學，Rancho 要求眾人在三十秒內找出兩個不存在的字的定義，從而點出整個教育體制的問題——每個人都在爭先找出標準答案，但卻沒有人為得到新知識而感到興奮。大學已淪為競爭的賽場，而不是學習知識的地方。

Rancho 可說是電影為回應當下社會問題而構作的新主體，這個新主體的特徵是不盲從傳統和權威，對知識充滿熱情，又富有想像力，而且面對難題往往能獨闢蹊徑。他勇於反抗權威和教條，追求變革及自我實現，尋覓屬於自己的理想生活。在這種烏托邦想像中，Rancho 不只對抗權威和既定規則，也成功扭轉了各人的命運，展現出另闢蹊徑的實踐可能及對另類生活的盼望。然而，Rancho 作為呼召改變的新主體，究竟與過往的主體有甚麼分別？這便要將討論轉向他與另一角色 Virus 的互動關係。

三、資本主義精神的轉換

電影是如此描述 Rancho 的主要對頭人——院長 Virus 的：「Virus 是我們見過最求勝心切的人，他不能忍受別人在他前面，即使是騎自行車。為了節省時間，他的恤衫沒有鈕扣，他的領帶有掛鉤。他以兩隻手同時書寫來訓練思維……」Virus 首次出場，便向新生演講「鵲巢鳩佔」的故事，形象地表明他相信的叢林法則：「杜鵑的生命從謀殺開始，這就是大自然——要麼競爭，要麼死……生存就是賽跑，你要是跑不快，就會被人踐踏。」片中這種汰弱留強的競爭想像，可說間接迫死了

Virus 自己的兒子和學生 Joy，更導致了 Raju 自殺。至於 Rancho，他甫出場便用小技倆懲戒玩新生的學長，突顯其反權威性格和靈活應變的能力。爾後無論是他向教授講述定義、拯救 Raju 的父親，還是到最後為 Virus 女兒接生等情節，都表現出突破既有框框的創新思維，及善於與群體合作的能力。

呂克·博爾坦斯基（Luc Boltanski）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精神在最近三十年出現了明顯的變化，二十世紀的三十至六十年代出現的精神：「主要代表人物是高級受薪主管……正義原則取績效主義的形式：依據各種經證明鑒定的文憑，這種精神是一種工業生產的邏輯與公民精神的妥協中和。」⁶直至八十年代，新的資本主義精神再次出現，並表現在一種名為「方案體系」的系統。這套「方案體系」有許多特點：「總是要有設想和方案，有甚麼東西要實現、要準備，與其他具有意願成就些事情的人結合……在這『方案體系』中的重要人物、能人，是那些能夠調適和變化的人……他有活力、自主並贏得他人信任，還能夠用他的觀念激發他人的熱情……他們是創新者，其典型是學者和藝術家。相對那些舊的、從事計算和計劃的幹部，他們具有直覺、鑒賞能力等最重要的素質。」⁷簡而言之，過去工業社會的領導者，是在官僚化龐大組織中，通過長期的事業規劃及資歷認證，慢慢晉升至高位；新資本主義精神的領導者（可以以比爾·蓋茨（Bill Gates）或史蒂夫·賈伯斯（Steve Jobs）為代表），卻是以靈活性、創意、直覺來贏得團隊的信任，並在其策劃的方案下令團隊成員實現自己的價值。

從呂克·博爾坦斯基（Luc Boltanski）的分析中，我們可發現電影中的 Virus 和 Rancho，恰恰便是兩種資本主義精神的代表人物。Virus 強調人際競爭、理性計算的效率、以成績衡量一切價值，此外，在待人處事上顯得教條、僵化和不近人情，

⁶ Luc Boltanski 著、張倫譯：〈資本主義精神及其批判的變化〉。載《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第 66 期，2001 年 8 月號），頁 13。

⁷ Luc Boltanski 著、張倫譯：〈資本主義精神及其批判的變化〉。載《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第 66 期，2001 年 8 月號），頁 14。

可說是工業體系的傳統精英；Rancho 則靈活變通，往往打破常規，而且善於溝通和合作，能贏得信任並激發同伴的熱情，同時對知識充滿熱情，在工程學上的日常應用有天賦的直覺。

四、新舊精英的和解

饒富意味的是，上述兩種代表不同資本主義精神的張力，在末段竟得到戲劇性的調和。這種調和一方面體現在同代兩種精神代表的合作，如以死記硬背方式讀書、依循主流方式發展事業、視 Rancho 為競爭對手的 Chatur，到最後竟被迫與身為知名發明家的 Rancho 簽合同，一同合作發展；另一方面則體現兩代角色的和解，如 Farhan 的父親一心希望兒子成為工程師，最後終於也認可 Farhan 放棄工程學而選擇當野生動物攝影師的理想。

除此以外，還有更具象徵性的情節。在電影初段，Virus 發表「鵲巢鳩佔」的偉論後，便拿出一枝當年老師送給他的「太空筆」，表示希望將這支花了數百萬才研究成功的「太空筆」，傳承給最出色的學生，接著問在場學生是否願意為這支太空筆而奮鬥。此時大多數學生均舉手表示願意，唯獨 Rancho 沒有。當眾人把手放下時，Rancho 卻舉手提問：「如果鋼筆無法在太空使用，為甚麼不使用鉛筆呢？這能省下數百萬呢。」這個實用主義式的反詰，令 Virus 一時無語，狠狠地嘲諷了 Virus 對精英身份的自我陶醉，同時也在暗示：Rancho 不願，也不必走 Virus 的道路。

可是到了電影末段，當 Rancho 活用工程學知識，與眾人合力協助 Virus 女兒 Mona 產子後，Virus 竟將太空筆授予 Rancho，並向 Rancho 說：「如果鉛筆筆尖斷了，在失重的情況下它會飄浮，吸入眼睛、鼻子、儀器裏……你錯了！你不可能總是對的！你明白嗎？」在此，「太空筆」作為傳統精英的象徵，曲折地找到他的繼承人——新資本主義精神代表 Rancho。這種新資本主義精神沒有割裂地取代傳統精英，而是必須延續和更新既有資本主義系統的餘緒（因此 Virus 強調「你不可能總

是對的」)。在這場戲劇性的轉折中，Rancho 終於得到 Virus 的認可，兩種資本主義精神的矛盾（同時也是電影的最大張力），最後達成了圓滿的和解。

五、Aal Izz Well（一切都好）？⁸

從以上可見，作為新主體的 Rancho，與其說是打破了舊有規則，不如說只是在既有規則下尋求別的可能。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另闢蹊徑的實踐和對於自由生活的追求，其實是建立在跨越階級藩籬和天賦差異的幻想中。也就是說，電影在提供某種烏托邦想像回應大眾對社會現實的不適時，伴隨出現的卻是掩蓋階級問題的意識形態功能。

面對激烈的學業競爭，在小康家庭成長的 Farhan，要掙脫的是其父指定要他將來成為工程師的命運；貧困家庭長大的 Raju，要掙脫的卻是極為惡劣的經濟處境。至於象徵自由精神的 Rancho，最初是以富家子身份出場，後來隨故事發展才揭曉 Rancho 原來只是園丁之子，不過代富家子上大學。Rancho 饒富意味的背景，提供了一種超越階級的想像（或神話）：出身不重要，大學學位也不重要，只要對學習抱有熱情，勇於追求理想和自由，你就會找到自己的路。

這種樂觀想像體現在不同的情節，例如 Rancho 曾建議沒錢讀書的小雜工——微米，找一套衣服扮作學生，然後到課室旁聽，如果被發現了，便去第二所學校繼續旁聽。這種小技倆貌似很具說服力，因為電影告訴我們，Rancho 小時候也是這樣求學的。不過只要仔細想想，便知道這種旁聽的讀書方法純屬幻想。微米要工作維持生計，豈有時間到處旁聽？即使有時間可以旁聽，書本從哪裡來？微米又是否聽得懂大學程度的課程？又如，Raju 的讀書成績不好，Rancho 竟這樣說：「老是擔心明天，怎麼能把握今天？」「恐懼是不會有好成績的。」Raju 的恐懼是否嚴重

⁸ 本片重要對白，也是其中一首插曲的題目。Rancho 曾對這句話如此解釋：「我們的心太容易恐懼了，有時候你得哄哄它。」Raju 問：「這樣問題就能解決嗎？」Rancho 回答：「不，但你會比較有勇氣去面對問題。」

影響學業，電影未有交代，但是 Raju 背負了改善整個家庭生活的希望，這種心理重擔有其物質基礎，又豈是一句「Aal Izz Well」（一切都好）可以釋除？

總括而言，Rancho 的角色雖然提供了一種批判精英教育體制的自由精神及獨闢蹊徑的烏托邦想像，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想像卻是以天才和個別際遇來抹除階級背景對學習的影響，在撇除了志向不同（如 Farhan 的志向是當攝影師，而不是工程師）的原因後，彷彿讀書成績差劣就是因為過於恐懼，以及對追求知識欠缺熱情（如 Raju）所致。而 Raju 最後也因為其真誠和坦率的性格，得到大公司人事部主管賞識。種種生硬設定，無不透露了電影的主題思想：在聲討精英教育的批判意識背後，電影無意挑戰整個教育和社會體制，反而強調個人在體制中可以憑藉靈活、熱情、勇敢、樂觀等性格特質，追求個人理想和自由生活。顯而易見，洋溢著本片的是樂觀情緒和自我實現價值，而這所謂「最崇高的快樂」，遺憾地嵌入了一種去政治化的想像。

參考資料：

1. Jane M. Gaines , "Dream/Factory", in *Reinventing Film Studies*, eds. Christine Gledhill and Linda Williams(London: Arnold, 2000), p100-129
2. Rajkumar Hirani, *3 idiots*. India: Vinod Chopra Productions, 2009
3. Luc Boltanski 著、張倫譯：〈資本主義精神及其批判的變化〉。載《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第 66 期，2001 年 8 月號），頁 11-17
4. 唐聞佳：〈向「死記硬背」教育發起「游擊戰」〉。《文匯報》，2011-03-24
5. 樊詩琪：〈《作死不離三兄弟》——追求最崇高的快樂〉，香港電影評論學會，2011-09-27。網頁連結：<http://www.filmcritics.org.hk/電影評論/電影新人類/《作死不離三兄弟》——追求最崇高的快樂>